

# 北平與莫斯科之間的新動向

## ——經貿、科技關係

· 尹慶耀 ·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八日，趙紫陽在北平告訴蘇聯的客人說，雖然「中」蘇兩國的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在過去幾年得到了滿意的發展，但不能不指出，兩國的政治關係沒有取得實質的進展。其時，蘇聯主管對外經濟聯繫的第一副總理伊·瓦·阿爾希波夫(I. V. Arkhipov)正在大陸訪問，出席「中蘇兩國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且達成了協議<sup>①</sup>。

同年六月十九日，胡耀邦在訪法期間，與密特朗總統出席記者會，在談到「中」蘇關係時，他說，「中」蘇在經濟交往方面的發展比較好，「中」蘇已簽署了為期長達五年的貿易協定，期間兩國貿易總額將達一四〇億美元之鉅，估計屆時更可能達到二〇〇億美元之數，平均每年的貿易額為四〇億美元。蘇聯還向「中國」提過願意提供優惠貸款，也願意與「中國」搞企業合作，但從政治關係來看，還看不出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sup>②</sup>。

七月廿八日，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在海參崴演說，呼籲中共改善雙方關係。中共《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出此一消息。九月八日，蘇聯另一第一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塔里津(N. V. Talyzin)訪問大陸，其任務之一，就是向中共解釋戈巴契夫演說的若干政策。

九月十日，塔里津會見趙紫陽時，趙仍稱近幾年來，「中」蘇經濟、貿易及科技、文化等方面的關係有了發展，但由於兩國關係中存在著障礙，因此，政治關係沒有得到實質進展，希望蘇聯方面對此能有所作為<sup>③</sup>。

註①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第一版。

註②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日，第一版。

註③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一日，第二版。

對於戈巴契夫海參崴演說關於改善「中」蘇關係的建議，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評價是：「我們認爲他講了一些關於改善中蘇關係過去沒有講過的新話，我們正在研究」④。鄧小平對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的說法是，戈巴契夫在海參崴提出了一些新意見，但是，並不表示在走向雙邊關係正常化方面，已邁出了一大步。他說，「有人說，中蘇關係會迅速改善，但我想不會」⑤。改善雙邊關係，是「中」蘇所共同需要的，而且現今正在進行中。但雙方在處理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態度上似乎仍有差異。中共寧願經貿先行、政治（包括黨與黨的關係）殿後，即使關係在實質改善中，也可以默默地進行，用不著大聲張揚。這當然是爲顧及它與西方的關係。蘇聯就不一樣，它希望政治關係改善與經貿關係同時進行，而且做到八分無妨說成十分，這樣一則對它加強共產集團的內部關係有好處，二則可以分化中共和美國的關係，增加它對美談判的籌碼。

中共要政經分離，這本來就不容易，何況蘇聯的和平攻勢都帶有政治意味，它能長期招架得住嗎？

中共聲言它不打蘇聯牌，也不打美國牌⑥，當然也不願自己作牌讓人家打，因而聲言「中國不做蘇美談判」籌碼⑦，可是，像現在這樣左右逢源、東西獲利的走鋼索式外交，真正能夠永遠保持平衡而不會失墜嗎？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談經貿與科技關係。

## 二

中共現有的工業基礎，無可否認是依靠蘇聯建立起來的。依照莫斯科的說法，從一九五〇至五九年，蘇聯幫助中共興建與擴建的工業企業與其他項目有四百多個。在這段期間開始營業的大企業有二五〇多個，它們裝配的是最新的設備，其中最大的如：鞍山與武漢的冶金廠、長春汽車廠、洛陽聯合廠（包括拖拉機廠、軸承廠與礦業設備廠），以及哈爾濱的電機製造廠、渦輪機廠與鍋爐廠。他們的生產量是：生鐵八七〇萬噸、鋼八四〇萬噸、煤一、七二〇萬噸、重型機器製造品六萬噸、運貨卡車三萬輛等。一九六〇年時，這些企業的產品與中共總生產量的比例是：約爲鋼的百分之四十、軋材的百分之五十強、貨運卡車的百分之八十、拖拉機的百分之九十強。

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期間，派往中共的蘇聯高級專家有一一、〇〇〇多人，分散於技術、科學、高等教育、保健與文化各方面。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中共第八屆黨大會上的報告中曾指出：「在我國工作的蘇聯專家與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專家們

註④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第一版。

註⑤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四日，第二版。

註⑥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一月廿日社論標題。

註⑦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一月廿二日「本報特稿」欄標題。

，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了卓越的貢獻」。

蘇聯約曾接受過三千名的中共專家學者，以使他們認識蘇聯相關方面的經驗。在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二年間，則有一一、〇〇名中共大學生與研究生在蘇聯學習訓練。由於蘇聯專家的幫助，中共在一九四九至一九六〇年間曾培養了一七、〇〇〇名科學工作者與教師。與經濟、科技援助進行的同時，蘇聯也協助中共建立了軍事工業<sup>⑧</sup>。

中共對於類似上引的蘇聯宣傳很少反駁，而自由世界也認為中共現有生產設備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五十年代蘇聯、東歐的製品。

依照日人長谷川慶太郎的說法，在一九五〇年的「中」蘇蜜月時代裏，蘇聯曾對中共輸出兩百座以上的工廠，因此目前的中共經濟仍然受到蘇聯強烈的影響。

他舉例說，如工業規格一項，中共所採用的是蘇聯式的「GOS」，與美國的「ASTM」或日本的「JIS」制度完全不同。任何技術專家都知道，在工業規格上採用那一國的方式，即是受該國家深刻影響的結果。由於中共所採用的工業規格是蘇聯式的「GOS」，其工業技術自然間接地為蘇聯所束縛。

他說，因此，儘管中共與蘇聯在政治上、思想上存有對立，但在經濟上、技術上仍然停留在一九五〇年代的蜜月時代。

他指出，中共為了促進其經濟現代化，首先引進的大型工廠即來自蘇聯。此為中共工業體制屬於「蘇聯型」的證據。經過了三十幾年已經老朽化的中共各種大工廠，目前已經面臨設備必須更新的階段，而輸進蘇聯製的機器則可以沒有任何摩擦，更可以順利地推展其經濟現代化、合理化。

又說，姚依林與蘇聯所訂的長期貿易協定，中共由蘇聯輸進工廠、機器，蘇聯則進口中共的糧食、工業原料以及輕工業製品，雙方的經濟關係逐步地改善<sup>⑨</sup>。

長谷川的話極有道理，不過，「中」蘇間的經濟、技術關係，可並非一直處在蜜月時期。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蘇聯通知中共，要在一個月內撤退在中國大陸工作的蘇聯專家，那是一項經濟制裁，對中共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因此，中共沉痛地說：「你們清楚的知道，蘇聯專家分布在我國經濟、國防、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等部門的二百五十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在技術設計、工程施工、設備安裝、產品試製和科學研究方面擔負著重要的任務。你們強迫蘇聯專家中斷自己的工作，撤回蘇聯，使我國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學研究項目被迫中途停頓，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入生產。你們這種背信棄義的行動，破壞了我國民經濟的原定計劃，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巨大的損失。在中國遭到嚴重

註⑧ 《蘇聯外交政策》，臺北：政治作戰學校譯印，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初版，八四～八五頁。  
註⑨ 張茂林譯，長谷川慶太郎，《赤色中國的迷惘》，臺北：《大眾》週刊第六二期，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一日出版，五九頁。

的自然災害的時候，你們乘人之危，採取這樣嚴重的步驟，完全違背了共產主義的道德」<sup>⑩</sup>。中共在指摘蘇聯時，也列舉了一些數字。它說：「你們應當記得，在蘇共領導片面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之後，我們曾經鄭重表示，願意挽留蘇聯專家繼續在中國工作，希望蘇共領導重新考慮和改變自己的決定。但是，你們却不顧我們的反對，背棄了國際關係的準則，在一個月的短時期內，悍然撤走了在中國幫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蘇聯專家，撕毀了三百四十三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二百五十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sup>⑪</sup>。這項打擊，使中共久久不敢再接受蘇聯的援助。

根據其他資料，過去，中共近代化企業建設，從蘇聯獲得二九一個企業單位的援助，從東歐獲得一〇八個企業單位的援助，合共三九九個單位。這對中共的經濟建設是絕對有益的。上述蘇聯援助的二九一個單位中，屬於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五七）的一六六個單位，屬於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六三）的一二五個單位。關於後者，中共所要求蘇聯提供的是比較嶄新的、精密的、大規模的成套設備及個別設備。可見，毛澤東當時並不反對「貪大圖洋」。

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蘇聯對中共經濟制裁，毛澤東只好強調「自力更生」。到「文革」時期，新的機器設備沒有來源，毛澤東就反對「專家治廠」，要工人們在舊設備上敲敲打打，去「修舊利廢」。那是毛澤東的極左作風，另一方面也是情非得已。

就上述各節看來，說「中」蘇經濟、技術一直處在蜜月時期，是值得商榷的。但雙方在這些關係上，却也並未完全斷絕過。中共政權初期，不僅機器設備來自蘇聯東歐，連經濟制度、政策，也大多從蘇聯照抄照搬。六十年代，中共嘲笑過赫魯曉夫「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把用「物質鼓勵」來提高生產看作離經叛道。毛澤東認為人越窮越革命，他要用「政治掛帥」增加生產，「文革」期間且有「窮過渡」口號出現。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文，即已公開斥責赫魯曉夫是伯因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和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的門徒，是修正主義。六十年代後半，蘇聯、東歐進行經濟改革時，中共就指蘇共的修正主義，表現在「利潤掛帥」、「復辟資本主義」等經濟問題上。

進入七十年代，中共與美國接近，蘇聯就指中共是修正主義。中共則指蘇聯是霸權主義。

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研究室的劉平，隨同中共對外貿易代表團赴蘇參加貿易談判，八年十三日返平，曾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講話，對蘇聯情況作了一次簡介。九月間中共「中國全國蘇聯文學研究會」在哈爾濱召開「全國第二次

註⑩ 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九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人民日報〉，同年五月九日。中共自稱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失敗後，又遭到連續三年的大災害。

註⑪ 同註⑩。

現代蘇聯文學討論會」，會議紀要中談到蘇聯社會制度等問題。又曾任中共駐莫斯科「大使」、回平後轉任「外交部」副部長再於同年九月赴蘇、以首席代表身分出席「中」蘇改善關係談判的王幼平，返回大陸後在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講話，也談到蘇聯問題，由香港《廣角鏡》雜誌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六日揭載。綜合上述種種文件和紀錄，內容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如：(一)透露中共仍在購買蘇製飛機、汽車、有色金屬、能源及燃料有關成套設備等，中共幹部喜歡蘇製「傻、大、粗(後又加「黑」字)」而耐用的東西；(二)認為在內政方面，蘇聯仍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則實行侵略、擴張政策，推行霸權主義。中共應將蘇聯的內政、外交分別對待；(三)蘇聯學者也認為中共是社會主義，「中」蘇兩黨分裂是暫時的。中共事務仍歸蘇共中央「社會主義國家共黨部」主管。

應該提起，人事的異動，對雙方關係也是有影響的。毛澤東死亡，鄧小平再度復出，他一反毛澤東作風，聲言不能有「窮共產主義」。在蘇聯方面，多年來一直主管意識形態工作並擔任最高蘇維埃聯盟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主張對中共強硬的蘇斯洛夫(M. A. Suslov)死亡，也使「中」蘇關係的改善減少了阻力。

### 三

大致說來，六十年代是「中」蘇公開分裂的時代，七十年代是「中」蘇鬭爭國際化時代(中共強調「三個世界論」並推動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八十年代則是「中」蘇關係逐漸改善的時代。

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演說，承認中共內部仍有社會主義體制。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就策定「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把共黨政權過去只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國家的和平共處五原則，推廣去「適用於我們(中共自稱——筆者)同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國家的關係」。胡耀邦在大會中正式提出「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但那與經濟無關。

雙方都在進行經濟改革，不再相互抨擊對方為修正主義了。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的演說，對中共「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經濟現代化路線表示稱贊，雙方還可能在改革方面合作哩！

中共經濟現代化的最大困難是生產設備的陳舊、老朽。五十年代來自蘇聯、東歐的設備業已使用了幾十年了。據中共本身一九八三年左右的統計，其現有工業交通企業固定資產的役齡如下：在十五年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二，二十年以上的占百分之三十三，二十五年以上的占百分之十四，建「國」以前的占百分之七。設備陳舊就會使工業落後，產品老化。中共機械電子工業的產品，真正達到國外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水平的，機械工業只占百分之十，電子工業也不過百分之十五，被人稱為煤老虎、電老虎的陳舊動力設備與運輸工具，長期沒有更新換代。國外，五十年代建立的工業企業，設備已經多次更新，產品已經換了兩、三

代，甚至三、四代，中共在那時候建立的許多工業企業都是二十多年一貫制，老面孔<sup>②</sup>。

談到技術基礎，中共現有設備的技術，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具有國際上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水平。其餘百分之八十的設備中，進入報廢階段的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到了更新改造期的占百分之廿至廿五左右，餘下的百分之廿至廿五左右的設備也已陳舊，但還勉強可以應付目前的生產<sup>③</sup>。

中共要現代化，就該把這些設備汰舊換新，但把四分之三的生產設備一起換新，是任何國家所不能的，何況是中共。因此，中共「國務院」確定，「七五」計劃期間主要是依靠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改建和擴建，而不是建設新企業<sup>④</sup>。

依靠現有企業，其工業規格是蘇聯式的，機器設備是蘇聯、東歐製的，甚至整個經營管理方式，也是學自蘇聯的。另一方面，中共內部留學蘇聯的幹部，如副總理李鵬（五八歲）、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宋健（五四歲）、公安部長阮崇武（五三歲）、地質礦產部長朱訓（五五歲），乃至天津市副市長李嵐清（五四歲）、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周光召（五七歲）等中央、地方、各大企業的重要領導幹部，不少是五十幾歲的「留蘇幫」<sup>⑤</sup>。他們所學、所知、所熟悉的制度和技術，都是蘇聯式的。這些人成爲「當權派」，與蘇聯、東歐的交流比較容易，自然願意依靠蘇聯、東歐來改造現有企業設備，事實上也正在這樣做。中共也想購置西方較新較高的技術設備，但那需要錢。靠留學生引進西方的科技，那要時間，緩不濟急。共黨國家間的貿易，是以貨易貨爲主，中共由蘇聯、東歐引進技術設備，可以食品、原料、輕工業品等交換，對缺少外匯的中共而言，那是相當便利的。

如此說來，改善對蘇聯的經貿、科技關係，是中共所需要的。那麼，從蘇聯方面說，它是否也需要呢？

一九八六年八月八日，中共的《中國青年報》刊載題爲《戈爾巴喬夫演說與亞洲、太平洋外交》的時事解說，該報指出的第一點就是：蘇聯爲了加速本國經濟的發展，對於日本的經濟力與「中國」的經濟改革，予以重視，認爲「日、中大門」不開，則亞洲戰略無從建立<sup>⑥</sup>。這些話不無道理。

蘇聯確實遭遇到國內經濟困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歐俄部分開發早，資源逐漸接近枯竭，今後開發必須擴展至東部地區。然而那裏天寒地凍，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糧食匱乏，開發起來成本高，且技術困難，但又非開發不可。當前，蘇聯在

註② 參閱任維忠，《固定資產更新改造與經濟振興》，中共：《紅旗》雜誌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一月一日出版），三七頁。

註③ 參閱程翔，《技術基礎迫切需要改造》，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第七版「中國經濟動向」欄。

註④ 新華社，一九八四年九月八日電。

註⑤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第七面。

註⑥ 轉引自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第一版。

遠東的戰力不斷加強，新武器在歐亞雙方同時部署，新西伯利亞的科學分院已開設多年，第二條西伯利亞鐵路的修築等等，自然與東部開發有關。一般認為，戈巴契夫的海參崴演說，就表示蘇聯要進出亞太地區，成爲亞、太地區的超強。

蘇聯開發西伯利亞，亟願獲得日本的資金與技術，二者間有過合作開發的計劃與項目，但因一則日本不能不顧及美國的反應，二則蘇聯的合作條件過於苛刻，使日本商人無利可圖，以致合作績效不彰。現今美日之間有貿易摩擦，美國迫使日元升值以及增加防衛經費等，使日本財團頗爲不滿，轉而想增進與蘇聯的經貿關係。而中曾根政府爲使日本成爲政治大國，也願與蘇聯改善關係。蘇聯自然不會放棄機會，於是首先有外長謝瓦納澤 (Z. A. Shevardnadze) 於一九八六年一月訪問日本，繼之是戈巴契夫本人也將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中前往東京訪問。其目的除分化美日關係、增強蘇聯在亞、太地區的地位外，更希望獲得日本的資金與技術。

說戈巴契夫重視中共的經濟改革，不如說他重視的是中蘇邊界的安謐和如何取得中國大陸的勞力與糧食，那些都是蘇聯開發西伯利亞所必需的。

#### 四

近年來中共常說爲了「四化」建設，它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湊巧一九八六年三月蘇共「廿七大」所通過的綱領中，也強調蘇共當前的基本方針是，「爭取國際和平環境，加速社會主義經濟發展」。

依當前的國際情勢看，如果長達七、五二〇公里長的中蘇邊界能夠和平，「中」蘇兩個共黨政權，就不會有影響到它們「國家安全」的外來威脅。這一點雙方都了解得很清楚。早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六日，*人民日報*就刊出解成章署名的文章「實行睦鄰友好政策和解決邊界問題」，文中強調「我們的黨正在領導十億中國人民爲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的國際和平環境，需要和平安寧的邊界。這就決定了我們繼續奉行和平友好的睦鄰政策」。文章明白指出中共盼望能夠解決中印、中蘇、中越的邊界問題。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四日，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柯爾年科 (G. M. Korniienko) 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演說時稱，蘇聯同中國有七、五〇〇公里以上的邊界線，我們不止一次表示，要使它成爲友好睦鄰的國界，現在蘇中邊境已經穩定下來<sup>①</sup>。

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胡耀邦在答覆港澳記者詢問時說，「你們知不知道我們中蘇邊界線有多長嗎？七千多公里……我們的

註① 日本《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七日，第九面。

國家與西方的國家都要和平共存，融洽相處，爲什麼我們同社會主義國家，邊界這麼長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要和平相處呢？<sup>⑧</sup>

既然「中」蘇雙方都需要和平的邊界，那個問題就不難解決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蘇雙方要求的似乎不僅是邊境的和平，更有可能進而合作。

談到合作，中共和蘇聯之間過去有過，現在又逐漸恢復。在五十年代「中」蘇合作時期，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大會通過了蘇聯第六個五年計劃，要集中力量開發烏拉爾山以東的西伯利亞地區，而中共則以東北的工業基礎，積極擴大生產，以其餘力支援西北和西南的工業發展，並將其東南的工業轉移至西北，建設西北的新工業區。中共和蘇聯優先發展的都是與軍事有關的重工業、動力工業等等，這實際是中共和蘇聯合作開拓亞洲心臟部基地的戰爭經濟基地計劃。當時蘇聯對外貿易部於一九五七年出版姆·伊·史拉德柯夫斯基(M. I. Sladkovsky)所著《中蘇經濟關係》一書，指出未來十年，蘇聯將使西伯利亞成爲具有各項重工業部門的基地，能源、動力也將長足發展，可充分提供中共所需的援助。西伯利亞及哈薩克斯坦，與中國大陸的西北、東北結成一個體系，則中國大陸的礦產及其他天然資源，由蘇聯加工當最爲經濟。而中共的糧食，尤爲人口急劇膨脹的蘇聯亞洲部分所迫切需要。史拉德柯夫斯基這項說法，雖有工業蘇聯、農業中共之嫌，但也證明蘇聯也是有所求於中共的。

爲了發展陸上交通，配合上述合作計劃，當時「中」蘇協議除東北原有鐵路可作爲「中」蘇交通孔道外，另修築：(一)烏蘭烏得——烏蘭巴特(庫倫)——集寧鐵路，以連結北平與莫斯科(已於一九五八年通車)；(二)修築柯克斗卡(Aktogay)——烏魯木齊(迪化)——蘭州鐵路，蘇聯段與土西鐵路連結，中國段與隴海鐵路接軌。一九五六年四月，蘇聯副總理米高揚(A. I. Mikoyan)訪平，給予中共廿五億盧布貸款，加速修築後一鐵路，預定一九五八年竣工。惟因一九五六年「中」蘇雙方已有歧見，一九五七年曾爲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發生公開爭論，而該路中國境內段迄未修成。但作爲西伯利亞鐵路支線的蘇聯境內段，則已修築到中蘇邊境的阿拉山口，距烏魯木齊僅五〇〇公里。

隨著雙方關係惡化，邊界貿易站也於六十年代被關閉。八十年代「中」蘇關係逐步改善，邊界貿易站陸續重開，鐵路也恢復修建。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蘇副外長級第一輪磋商<sup>⑨</sup>時，雙方同意開放關閉了二十年之久的新疆省兩處邊界貿易站，當指北疆的霍爾果斯(Huoguosu)和南疆的吐爾尕特(Toergate)而言，該兩地早自一八八一年就闢爲中俄通商口岸。一九八二年十

註<sup>⑧</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第二版。

註<sup>⑨</sup> 一九七九年九、十月起，「中」蘇在莫斯科舉行副外長級關係正常化談判，約定第二輪談判於一九八〇年在北平舉行。嗣因蘇聯進軍阿富汗，中共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九日單方面宣告談判無限期延期，直至蘇軍撤出阿富汗爲止。惟一九八二年十月，雙方副外長級談判在北平恢復舉行，中共乃將談判改稱磋商。



一月十六日新華社報導，同日起「中」蘇已恢復在霍爾果斯口岸交接貨物，稍後當恢復在吐爾戈特交接貨物。一九八三年以降，東北的滿洲里（隴濱）、綏芬河市、黑河市，內蒙的二連浩特，新疆的塔城，都相繼開放。又東北的同江港（位於松花江與黑龍江交界處，距俄邊約五公里左右），則於一九八六年五月廿日重新開放，供蘇聯船舶使用。

關於鐵路方面，中共正在新疆修築：（一）北疆鐵路——由新疆的烏蘇向西修至阿拉山口，與蘇聯境內段接軌，預計「七五」計劃期間完成；（二）由南疆的喀什（Kashgar 疏勒）向西修至蘇聯境內的奧什（Osh）。在東北，由黑龍江的北安至中蘇邊境的黑河市，稱為北黑鐵路，也是由於關係惡化中途停工的。現已於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起復工，由「中」蘇聯合修築，並大力擴建黑河市。

前述戈巴契夫的海參崴演說，對建設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通往蘇聯哈薩克共和國的鐵路表示積極態度。他也提到中蘇邊界河流可以主要航道最深處劃分邊界問題。同年八月六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卡比察（Mikhail S. Kapitsa 中共譯買丕才）談話，表示蘇聯願考慮中共立場，以黑龍江和松花江的主流為中蘇邊界線。十月初，蘇聯建議和中共合作開發黑龍江中的若干島嶼（包括黑瞎子島、八岔島等），而中共則願就此加以研究。蘇聯的算盤不限於這些島嶼的合作開發，它更希望在開發西伯利亞的過程中，獲得中共對糧食和勞力的支援。早在一九八五年中，就有蘇聯要求中共提供勞力而中共正加以檢討之說<sup>②</sup>。中共現對自由世界有勞力輸出，那麼向蘇聯提供勞力，也並非不可能。如此的合作實現，對整個亞太戰略形勢，就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了。

## 五

五十年代，「中」蘇間的貿易額是不斷爬升的。一九五九年超過二〇億美元，是最高峰。此後逐年降低，到一九七〇年已降至四、〇〇〇多萬美元，是最低點。進入八十年代，「中」蘇關係開始解凍，貿易額也隨之增高，一九八五年為十九億元。根據一九八四年七月姚依林訪蘇時所簽一九八六—九〇年五年長期貿易協定，就正如前引胡耀邦所說，總額預定一四〇億美元，雙方爭取超過二〇〇億美元，今後發展潛力仍然很大。此外，一九八五年雙方邊境直接貿易額為二、四二〇萬盧布，約合三、三四〇萬美元，佔雙邊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一點七。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蘇聯第一副總理主管對外經濟聯繫的阿爾希波夫訪問中共時，與中共簽署三項協定：

（一）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研究、交換生產工藝和生產技術知識、設計、建造和改造工業企業和其他項目，相互提供技術服務

註②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第七面。

和培訓技術人員。

(二)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交換科學技術團組、學者專家，交換科技情報和資料，共同研究和交換科研成果等。

(三)成立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協定——主要任務為監督彼此間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方面協定和協議的執行，促進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的穩步發展，共同研究進一步擴大合作的措施<sup>②</sup>。

一九八五年姚依林訪蘇時，除簽署五年貿易協定外，還簽署了一份蘇聯協助中共建設和改造工業項目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規定雙方將在設計、提供技術資料、供應設備和派遣專家、技術人員方面進行合作。蘇聯將在中國大陸援助興建七間工廠，並在發電廠、冶金、機器製造、煤炭、化工及運輸方面協助十七間工廠改造為現代化<sup>②</sup>。根據這個協定，蘇聯專家將可於撤退廿幾年後重返中國大陸。

如前所述，阿爾希波夫於一九八六年三月率團抵平，參加「中蘇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差不多與戈巴契夫抵達遠東同時，阿爾希波夫又以私人就醫名義抵達北平，八月中他曾非公開的與中共三名副總理——萬里、姚依林及李鵬會晤。九月八日蘇聯另一第一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塔里津率團訪問中共，他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且為戈巴契夫密友，其地位自較阿爾希波夫（近已因病辭職）為重要。他在平期間，曾與中共「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宋平簽署協定，雙方在交流經驗、知識方面進行廣泛合作，今後關於計劃經濟的策定、運用，雙方將舉行定期會議。兩國副外長羅加喬夫（I. Rogachev）原任第一遠東司長，八月中旬升任副部長）與錢其琛簽署新的領事協定，再度確認一九八五年已基本同意的在列寧格勒及上海互設領事館（十月初傳出當時協議在基輔、阿拉木圖、伯力及瀋陽、廣州、迪化增設新領事館）。蘇聯對外貿易部副部長葉·帕·巴甫林與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王品清就兩國貿易問題進行了換文。

戈巴契夫海參崴演說中，提及蘇聯願在太空領域中與中共合作，也提及撤軍問題。因此，當塔里津啓程前往中國大陸時，法新社報導，他將向中共提出太空合作建議，並準備與北平討論「具體步驟」，按比例減少共同邊界駐軍水平及常規武器。當塔里津結束訪問時，法新社又報導，蘇聯可能會革新五十年代在蘇聯援助下建成的大約一百間中共企業（西方較早報導為一五六間），為此將派出廿六年來第一批專家一百多人到中國大陸<sup>②</sup>。

九月廿五日新華社透露，中共外長吳學謙和蘇聯外長謝瓦納澤在紐約會晤，同意於明（一九八七）年恢復陷於僵局的邊界談

註①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九日，第一版。

註②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第二版。

註③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第一版。

判<sup>24</sup>。奇怪的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發言人吳興唐對記者透露了這一消息，他說即將恢復的「中」蘇副外長級邊界談判將談到中蘇邊界航道主權問題。他在回答記者時表示，若談判成功，對發展中蘇邊境貿易及沿江中國漁民捕魚業有好處。他又表示，中共可能會考慮把沿江城市對外開放<sup>25</sup>。

應當提起的是蘇聯也在實行經濟改革，其方式很多和中共雷同，因此莫斯科不再抨擊中共的經改路線，戈巴契夫演說，對在與西方先進國家合作下從事經濟發展的鄧小平路線，事實上是加以肯定、稱贊<sup>26</sup>。姚依林在歡宴塔里津時說，中共關注蘇聯的改革，希望相互交流經驗<sup>27</sup>。而塔里津在大陸曾建議雙方舉辦合營企業，因此雙方同意今後由兩國有關當局就合營企業的行業選定及具體的合營計劃，進行磋商<sup>28</sup>。

今後「中」蘇在經貿、科技合作方面已無阻力，可順利進行，但中共在這些方面對蘇聯的依賴，也就越發加重。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鄧小平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華萊士訪問，他說戈巴契夫海參崴講話有點「新東西」，我們對他的新的帶「積極性」的東西表示了「謹慎的歡迎」。但他的步子邁得並不大，蘇聯外交部官員講的話，調子同戈巴契夫不一樣，蘇聯內部對「中國」政策究竟怎麼樣，我們還要「觀察」。九月三日鄧小平同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會晤時，也說了些跟上述差不多相同的話，也同樣提出三大障礙問題，並且說「中」蘇關係不會迅速改善。中共其他官員談話，當然不會有和鄧小平不同的調子。

中共毫不遲疑的同蘇聯增進經貿、科技合作，但却以三大障礙為擋箭牌，拖延政治方面的關係正常化。由羅加喬夫率領的蘇聯代表，於十月五日抵平，與中共展開第九輪磋商。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則於同月七日起，在中國大陸訪問四天，與中共討論軍事合作問題，而美國軍艦也將前往中國大陸港口訪問。中共的作法，顯然是要在美蘇之間維持暫時的平衡，左右逢源地從雙方獲利。但這種政策究竟能維持多久，只好留待日後另外為文剖析了。

註<sup>24</sup> 臺北《聯合報》，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廿六日，第一版。

註<sup>25</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第一版。

註<sup>26</sup>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日，第七面。

註<sup>27</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第二版。

註<sup>28</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九月廿日，第二版。